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227期)

本 期 要 目

- 拆掉洱海民宿：环保令背后的挣扎与矛盾
- “2018年中国自然保护地十件大事”：保护地统一管理居首
- 湖南省规范自然景区玻璃桥及玻璃栈道建设
- 珠峰景区“永久封山”不实 多部门将出台更严格环保措施
- “循古向新”才能可持续
- 修复吴哥：一场跨越26年的30国抢救行动（下）
- 厄瓜多尔政府多举措拯救加拉帕戈斯环境

2019年2月15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目 录

热点关注

拆掉洱海民宿：环保令背后的挣扎与矛盾	-----3
“2018年中国自然保护区十件大事”：保护区统一管理居首	-----11

新闻摘要

湖南省规范自然景区玻璃桥及玻璃栈道建设	-----14
杭香格里拉饭店东楼将降拆 未来西湖湖景呈现更完美	-----15

社会纵横

珠峰景区“永久封山”不实 多部门将出台更严格环保措施	-----16
----------------------------	---------

时事评论

“循古向新”才能可持续	-----21
国家公园的方向：保护第一 公益优先	-----22

世界遗产

修复吴哥：一场跨越26年的30国抢救行动（下）	-----25
-------------------------	---------

环球博览

厄瓜多尔政府多举措拯救加拉帕戈斯环境	-----29
奇里比克特山脉国家公园成全球最大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31

拆掉洱海民宿：环保令背后的挣扎与矛盾

【《财经》杂志2019年1月21日】历时3个月的洱海民宿拆迁，将云南引以为傲的旅游经济放在了环境保护的对立面。掌声消失，大理这一中国民宿业发展样本矛盾凸显，没有赢家。

2018年12月末，云南大理的白日暖如初秋。

这个时节虽是大理旅游的淡季，但舒适的气候此前一直能吸引不少躲避寒冷和雾霾的国内游客。

他们会从大理古城曲折向东，往洱海方向走4公里，去看看龙龕码头附近的云渡客栈，自从电影《心花路放》播放后，这家民宿就成为众多游客前往洱海的理由；除了云渡客栈，还有位于磻溪村、拍摄《后会不是海》的洱朵，以及归心、嘲风、宽海等众多明星民宿。许多游客正是在影视剧和网站上看到这些别具特色的民宿，才进而来大理领略洱海风光。在游客心中，民宿早已成为洱海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的12月不同以往。龙龕码头的美景中，出现了不和谐的画面：遭遇拆除的海景民宿。从龙龕村继续北上，经才村、西城尾村、马久邑村，磻溪村、桃源村……能看到沿洱海岸边建起的民宿多已倒下，其中就包括云渡、洱朵、宽海这些游客耳熟能详的民宿。过去三个月内，因环境整治需求，大理已有1800多家民房和民宿陆续被拆，其中540多家为与洱海“零距离”的海景民宿。

一栋栋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旅游胜地的氛围消失，裸露的石料碎渣悬挂在断裂的钢筋上，门窗化为废墟散落于堆积了两米之高的建筑垃圾中，白族房屋顶上的瓦猫从缠绕的铁丝和碎石块中探出几乎辨认不出模样的脑袋，空荡荡的门洞和窗洞像是张开的大嘴，游客向往的洱海晴空几欲穿堂而过。

“海西拆迁，很多慕名来住海景民宿的游客不来大理了。”稀稀落落的游客数量，让大理古城内的旅行社工作人员感到担忧。“因为民宿拆迁，我都要失业了。”一位为民宿接送游客的司机师傅同样因游客量的减少不知所

措。他所供职的民宿在2018年12月27日的拆迁行动中已经化为废墟。

大理民宿业常被看作中国一代民宿人的标杆，是莫干山、泸沽湖、普者黑等各处新兴民宿的学习对象。大理和民宿也互相成就了对方：最初的一批民宿投资者名利双收，地方收入和就业也得到了明显的拉动。然而，从2017年开始、历时一年多的整治运动突然将云南最引以为傲的旅游经济放在了环境保护的对立面，并最终以为期三个月的拆除行动结束。掌声消失，民宿的未来风雨飘摇，地方旅游业发展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大理这一中国民宿业的发展样本矛盾凸显，矛盾中没有赢家，原因亟待探寻。

最后的晚餐

2018年12月27日。傍晚6点半，落地窗外，洱海的粼粼波光泛起点点晚霞的红晕，磻溪村洱海人家客栈里的人们沉默不语。

马久邑村民宿业主龚澄的眼眶有点红。就在一小时前，她和丈夫共同经营的海景民宿刚被拆掉。十米挖臂一铲铲凿下去的画面，以及挖掘机的轰鸣作业声，依旧在她脑海中残留。龚澄今天经历的一切，明天将再次发生在刘墨身上，这一夜过后的28日，她的洱海人家客栈也将被拆除——28日是大理市政府定下的拆迁最后一日，之后，拆迁队的工作将是继续推挖和处理房屋废墟。

大理地处中国西南高原盆地，阳光明媚，四季如春，坐拥云南第二大淡水湖——洱海。人们习惯将洱海东西两侧称为海东和海西。海东地势起伏较大，海西是苍山十八条溪水冲积形成的山前平原，地势平缓。海西的人口密度远高于海东，基础设施更完备，同时毗邻大理古城，适宜游客游玩的村镇更多。在此次拆迁中，海西的波及面也更广。

大理是中国最早发展民宿业态的中国旅游城市，与传统酒店不同，民宿独有的人文特色建造设计风格，以及人性化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其中，又以推开窗就可观洱海的海景民宿最为炙手可热，一晚入住价可达上千元，是大理古城内一些客栈住宿价格的十倍以上。

这些海景民宿的命运在2018年10月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评估、拆迁启动，形势急转直下。”龚澄告诉《财经》记者。因洱海生态保护需求，早在2017年4月，洱海边的民宿和餐厅就被迫开始停业整顿，他们被告知，2018年6月30日的环洱海截污工程完工后，就可恢复营业。这一期限来之

后，一批民宿陆续恢复营业，但也有很多业主始终没有等来复业通知，却听到了海景民宿将被拆掉的传言。

此次拆迁的目的是为实施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腾出空间，这项建设依然是洱海生态修复的一部分。蓝藻爆发被视为包括洱海在内的湖泊水质下降的显性体现。由于农业、养殖业和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1996年，洱海首次爆发全湖性蓝藻，2003年和2013年，洱海先后再次爆发蓝藻。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政府的整治措施也不断加码。但很多民宿业主仍然不愿相信他们的客栈最终会以永久性拆除收场，因为民宿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政府也一直在鼓励民宿的发展。2011年，大理市明确提出将旅游业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并大力支持洱海边民宿客栈的兴建。2012年《云南日报》一篇报道将包括洱海周边民宿在内的大理民宿客栈称作大理旅游转型升级重要载体。2017年大理市政府发布数据显示，旅游业创造收入264亿元，占大理市全年GDP的70%。旅游业已是大理的支柱产业，民宿则是大理旅游的一张王牌。

这一天还是来临了。12月27日，刘墨和几位民宿业主在客栈里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晚餐话题是：明天会有几台挖掘机，从哪个角度最先破开这栋有明亮大落地窗、可以一眼看到洱海最美风景的房子。

“我早上在朋友圈发了照片，做了一个谢幕，得到170多人的问候。”刘墨笑了笑。“你可能感觉我们坐在这里讨论，很平静。从停业20个月，到知道保不住客栈，大家现在只是想赶快结束。”她对《财经》记者说。

蓝线、绿线、生死线

洱海污染整治措施的升级早有征兆。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洱海周边旅游发展管控不到位，洱海水质下降。作为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以及大理市饮用水水源地，洱海的生态治理问题被提上政府工作日程。

从那一年起，大理的民宿业主做了多次自建环保设备的工作。从最初自建五级、七级化粪池，到将污水接入村污水处理系统，再到自建污水处理设备，排污处理要求一直在变，新的设施投入使上一轮设施废弃掉。因民宿规模不同，民宿业主们在排污处理方面的花费从十几万到上百万元不等。

环境整治在2017年4月达到新一轮高潮。按照大理市政府2017年3月末发布的三号公告，洱海周边和入湖河道沿岸总计2498家餐馆和民宿客栈被关停整治，其中民宿客栈1900多家，目的是减轻洱海入湖污染负荷，促进洱海水质稳定改善。关停时间延续至2018年6月30日大理环湖截污工程完工。环湖截污工程是近年来大理重点开展的环境整治工程，完工后，不仅是洱海边民宿产生的污水不会排入洱海，理论上，洱海周边农业、养殖、生活产生的所有污水都将不会被排入洱海。

才村民宿业主朱鹏告诉《财经》记者，事实上，早在关停前，就已有民宿业主按照要求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完的水也自行拉到洱海下游污水处理厂，没有一滴污水流入洱海，但是这些民宿也在关停的范围之内。2017年4月到2018年6月，15个月的关停使大多数民宿都遭受了200万—400万元不等的营收损失。在这期间，他们一直盼望着环湖截污工程完工后能尽早重新开业。

但就在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2018年5月30日，大理市政府又公布了《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划定方案》，成立负责拆迁腾退的“三线”指挥部，为几个月后的拆迁腾退埋下伏笔。按照以上方案，海拔1966米所在界桩一线为“蓝线”（湖区界线），由蓝线向陆地延伸15米处为“绿线”（湖滨带界线），蓝线外沿100米为“红线”（水生态保护区界线）。绿线以外的一些客栈得以重新开业，而蓝线和绿线之间的海景民宿、民房则命悬一线。

突如其来的拆迁决定让民宿业主感到愕然。“一个月前，这边还是一整片高端民宿，其中不乏曾经被政府推崇的标杆型客栈。”行驶在颠簸的路面上，西城尾村海景民宿业主刘海鸣不忘指给记者临海一侧拉开的黄白相间的警戒线，以及另一侧墙壁上用油漆刷出的几个大字：“打好洱海保卫战”。

民宿业主们感到委屈的是：他们一步步按照要求，自费搭建环保设施，又停业十几个月等待环湖截污工程完工，但最终等来的是民宿拆除的结局。此外，如果因洱海生态保护需要，洱海周边本不应该建造房屋，又为何没有及时做好规划，让民宿业主为这一错误买单？

针对民宿业主对政府政策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疑问，大理市委书记高志宏在接受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采访时表示，在客栈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

规划和审批存在滞后的问题，但他也强调，洱海生态保护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蓝藻大规模爆发，长期难以恢复，游客追求的诗和远方、山清水秀将不复存在。

“洱海水质变化太快了，稍微松懈一点点，稍微有些措施跟不上，水质就不是现在这个水质了。”高志宏说。

在采访写作本文期间，《财经》记者联系了负责此次拆迁的大理市“三线”指挥部，并联系走访了大理市政府宣传部，多次致电、发短信给宣传部工作人员。截至发稿时，对方未接受采访请求。

谁在污染洱海

洱海的污染问题并非民宿业态发展起来后才出现。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造纸厂等工业生产兴起，到七八十年代养殖业成为洱海周边重点发展行业，以及长久以来自然形成的农业农村生活，再到城市生活和第三产业出现，每一个人类行为都对洱海的水质产生着影响。

随着工厂的关停并转，近年来，工业对苍山洱海地区的污染大大减小。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教授王圣瑞向《财经》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主要的洱海入湖污染源是农村生活污染、农田面源污染、城镇生活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环湖旅游产生的氮负荷和磷负荷则为7%和9%，远低于以上主要污染因素。此次划定的15米蓝线和绿线拆迁范围内民宿的污染占比尚无精确百分比，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产生的氮、磷负荷一定小于以上数字，可见15米拆迁范围内的环湖旅游并非洱海污染主因，给洱海造成的污染负荷也偏小。

在洱海环湖民宿和餐饮停业整治的2017年，环湖旅游污染负荷的确大幅降低，但农田面源污染等洱海污染主因呈现出扩大趋势，其中农田面源污染的氮负荷增加8%，磷复合增加4%，农村生活和城镇生活污染的磷负荷亦各自增加1%，对洱海水质影响较大。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研究员杨彦锋告诉《财经》记者，保护好苍山洱海的生态环境，旅游业和民宿业依存的青山绿水才会存续，从这个角度看，大理的环保大方向没有问题。在政策执行层面上，洱海边集中存在的民宿最显性，容易成为环境整治的抓手，但洱海水质病因很多，拆掉民宿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解释，环湖截污工程竣工前，大理大量村庄管网和沟渠不达标，化肥、农药、牲口粪便造成洱海水质下降。环湖管网建设完工后，虽然环洱海污水可以纳入管网，但雨水和地表径流依然会将污染物冲进洱海，苍山上的生活污染和农田面源污染物也会随着雨水流下来。政府应更多地投入于升级改造农村管网，完善雨水污水收集、农药固废处理，提升乡村卫生等级标准，做高效农业，增强苍山植被保护，落实源头管控，综合提升洱海环境，同时做好大理市和周边地区的截污，做好“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管网，从根本上提升入湖水质。

杨彦锋认为，在环保治理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民生经济损失和对个体的伤害。生态和环境的存续是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和谐体现，“一刀切”的拆迁方式行政效率高，但伤害性较大。如果认定外来的民宿业主等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会造成污染，可以向民宿业主征收污染治理费，将治理费用在更有效的生态治理方法上，通过综合补偿，算一个环境治理的大账。从人文历史保护和景观破坏方面看，拆除行动亦值得商榷。虽然海西的民宿和民房有一定程度的过度建设，但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会切断临海而居的乡村机理和风貌，洱海边也损失了风景和人文景观。

谁为损失买单？

按照大理市政府的安排，拆迁腾退的空间将会用于修建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并建设生态湿地和生态廊道，恢复洱海自然生态岸线，形成完整的陆地与湖泊水体过渡缓冲区域，这对于提升洱海水生态系统稳定性、防止生态退化、改善水质有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阴劼告诉《财经》记者，洱海周边的确有必要修建环湖缓冲带，缓冲带可以有效控制和截流进入洱海的面源污染物。

在中国，水生态环保规划普遍采取划分生态保护线，即自岸线向外延伸一定米数的方式。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刘博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在我国的生态保护中，禁止建设是土地管理层面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够为接下来的水源净化、植被保护提供空间。洱海岸线周边的建筑拆迁工作，是保护洱海，隔离人为污染的第一步，也是生态管理工作开展的奠基工程。

一些民宿业主和规划专家也认同环湖缓冲带对洱海生态保护的作用。但

他们认为，划定保护范围的工作应该在最初做生态环境规划时就完成，划定之后要严格执行，如果因为环保规划和执行不谨慎，最后在居民生活稳定的环境内做弥补性划线拆迁，比较容易造成本可以避免的民生伤害。

事实上，大理州的洱海保护相关条例的确对环湖缓冲带有过要求。2004年大理州颁布的《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修订版中规定，以海拔1966米高程为洱海湖区界桩，同时规定在界桩内5米、界桩外15米的暗滩营造环湖林带。但是，这一条例在实际工作中未被严格执行，政府依旧批准了这个标准界限内的民宿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

“拆迁保护的确是后知后觉的事，以前没管，可能是因为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地普遍没有意识到问题。”一位城市规划人士表示，不断的建设发展让大家意识到环境规划保护的重要性，例如在没有雾霾前，人们做城市规划时也不会预留风道，如今预留风道已经进入城市规划考虑范围。

从关停到被拆迁，洱海边民宿业主的遭遇也折射出，从事民宿这一新兴业态的从业者，其合法权益保障存在疏漏。民宿业主王雅科回忆，作为当事人，她和其他业主从未被邀请参与任何改变他们人生方向的会议，没看到任何公文，没拿到任何补偿款，房子就被拆了。“只是反复听到这样一句话：‘先停了再说，先拆了再说。’”

承接了不少拆迁案件的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在明对《财经》记者说，在此次拆迁过程中，政府方面只与房东签订补偿协议，民宿业主既未参与评估机构的选择，也未参与补偿协议的签订；在拆除过程中，也只是给业主发了拆违通知书，补偿款尚未到位，房屋就被拆除；还有许多民宿业主对补偿标准不满，认为其无法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

拆迁也造成了民宿业主和房东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民宿业主都是外投资者，他们租用当地农户的民房来改建民宿。从法律上看，拆迁腾退后房东应把剩余年份的租金退还给民宿业主，但民宿业主们表示，因为房东也遭受了损失，所以几乎没有房东愿意这么做；同时，因为拆迁的民宿有的是全拆，有的是部分拆，房东想让民宿业主在拆了一部分的民宿中继续经营，但不少民宿业主认为很难在结构已经被破坏的房子中继续经营。“本来以前和房东处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受损失，结果反目成仇。”刘海鸣说。对于因此次拆迁腾退而遭受的损失，有人用“投资有风险”提醒刘海鸣。“但这不是

正常的经营风险。”她说。

长痛还是短痛

“休克式疗法”对旅游业的冲击已经显现，很多从业人员都明显感到游客少了，收入也在下降。

“那时候不分淡旺季，我们全年都不休息。”一位为民宿接送客人的司机师傅感慨道。关停前，业务好的时候他一个月赚七八千元。“大家都有客源，一年四季没有空房子，现在没客人了嘛。”他说，“大理古城客人也少了，因为很多人都是冲着海景房过来的。”

“很多老客人都问我海景客栈什么时候复业，得知客栈被拆后，他们的选择是不来大理了。”龚澄能感觉到，停业后，大理的游客只剩下往年的三分之一，她的朋友在大理古城经营民宿，单晚价格至少跌了20%。舞蹈家杨丽萍的太阳宫所在地双廊镇虽已部分恢复营业，但也受到了影响。“整个大理是一个综合体，如果到处是工地的话，游客体验不会好。”

也有人认为，冲击只是短期现象，长期影响现在还难下结论。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教授翁瑾对整治结束后大理旅游业的未来表示乐观。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将环湖空间重新变为公共空间，对旅游者是一个好消息，也有利于当地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引入新的业态。“公共空间导入的新的人流会再度提振旅游民宿业。”翁瑾对《财经》记者说。

一位在大理生活了十多年的居民表示，此前洱海民宿的搭建的确过于密集，一些民宿的露台贴水而建，如果洱海边留出公共空间，不住在海景民宿的游客也能够更游刃有余地观赏洱海，这是一件好事。

大理州的旅游开发方向也有调整。随着昆明—大理高铁和丽江—大理高铁的开设，未来从滇西北涌入的客源会大幅增加，给苍洱地区带来接待压力。据接近大理市旅游规划的人士透露，目前大理市的规划是，包括海西、海东在内的苍洱地区新开发面积缩减34%，海川新区等地正被开辟为新的旅游开发区。“另辟新区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拉大发展架构，而不是不断在苍洱盆地里增加新的生活生产。”杨彦锋说。

但是，离开洱海，已经成为许多民宿业主的选择。一些依旧对做民宿抱有热忱的人，选择前往政策更稳定的东南亚经营民宿。有的人则被迫回归曾经逃离的城市生活。

刘海鸣在大理市内的一家旅游学院找到一份教学工作，内容是为民宿新手普及做民宿的经验。“我们现在已经不忍心再讲民宿的美好了，只是劝大家，入行需谨慎，如果做民宿，少做硬件投入，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投入就打水漂了。”为了维持生计和还建造民宿欠下的钱，龚澄依托此前积攒的老顾客做起了微商，销售云南土特产。民宿业主们大多一边应付生计，一边等待大理市政府给出关于赔偿和安置的最终答案。

坚守在大理的许多民宿业主依然抱有期待：待到洱海水重回捧起就可饮用之时，大理会再度成为他们曾经向往的安居乐业之地。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刘海鸣、刘墨、龚澄、朱鹏及洱海人家客栈均采用化名。）

（作者：马霖）

“2018年中国自然保护地十件大事”：保护地统一管理居首

【澎湃新闻2019年1月29日】1月2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2018年中国自然保护地十件大事”。

2018年是我国自然保护地实现统一管理的起始之年，为总结回顾2018年自然保护地的重大事件，加强自然保护地宣传，扩大自然保护地社会影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中国绿色时报社联合开展了“2018年中国自然保护地十件大事”评选活动，这也是我国首次开展的自然保护地大事评选活动。

十件大事具体包括：

1、我国自然保护地实现统一管理。

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农业部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此，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有了统一管理机构，实现统一管理，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九龙治水”“多头管理”的问题。

2、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2018年4月10日，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2018年5月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职责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整体移交国家公园管理局。

3、首次开展全国自然保护地大检查。

5月3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决定，自当年6月起，在全国集中开展自然保护地大检查行动，旨在摸清家底，找准存在的问题。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部署开展自然保护地大检查活动，为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奠定基础。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基本完成自然保护地大检查工作。

4、贵州梵净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跃居世界第一。

7月，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中国贵州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增至53处，世界自然遗产增至13处，一举超过之前并列的澳大利亚和美国，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总数跃居世界第一。

5、黄山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新成员。

7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市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第30届国际协调理事会议上，中国黄山以34票全票通过，正式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中国第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黄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有2385种高等植物和417种脊椎动物。因其占全国0.044%的陆地面积分布着全国6.92%的植物物种和9.55%的动物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世界108个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被认定为中国33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黄山-怀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

6、我国六城市成为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决定在全球开展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及申报认证工作，以表彰先进、扩大影响、唤醒全世界聚焦湿地保护。迪拜时间2018年10月25日，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在国际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上宣布全球首批18个国际湿地城市，中国常德、常熟、东营、哈尔滨、海口、银川入选，占

入选城市的1/3，彰显了我国在湿地保护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国际地位。

7、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挂牌，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10月29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兰州挂牌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成都挂牌成立，标志着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步入新的建设阶段。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总面积5.02万平方公里，森林、草原、荒漠、湿地生态系统均有分布。其中，甘肃片区总面积3.44万平方公里，青海片区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试点区总面积2.71万平方公里，试点区分布的野生大熊猫数量占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的86.59%；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占全国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的70.35%。

8、四川光雾山-诺水河、湖北黄冈大别山成为世界地质公园新成员，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数量居世界首位。

4月17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04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国的四川光雾山-诺水河、湖北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成为我国第36、第37个世界地质公园。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总数为140个，分布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地质公园项目的发起国，中国长期占据世界地质公园榜首。

9、2018年中国国家公园科研机构猛增，为国家公园体制科学建设奠定基础。

2月8日，国家林业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11月11日，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在清华大学成立；12月6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规划研究中心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揭牌成立；12月8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委员会成立大会，等等。我国国家公园科技支撑力量迅速增长。

10、石油开采彻底退出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逐步恢复。

12月16日，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油田生产退出整改工作，初步通

过新疆自治区专家组的联合验收：沙北油田等3个井区已被整体拆除，284口油井被关停拆除，修复地表面积35.2万平方米。验收组认定，“保护区原始性和自然性几乎接近纯自然状态”。这标志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油田生产在这里画上了句号，栖息其间的野生动物拥有了更加宽广、宁静的家园。

（记者：吕新文）

新闻摘要

湖南省规范自然景区玻璃桥及玻璃栈道建设

【长沙晚报2019年2月14日】近年来，湖南一些自然景区热衷建设玻璃桥及玻璃栈道，以此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但其存在生态环境破坏和安全风险。为进一步严格限制玻璃桥及玻璃栈道建设项目准入，强化质量安全管理，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省住建厅下发《关于加强自然景区玻璃桥及玻璃栈道建设管理的通知》，湖南将全面规范自然景区玻璃桥及玻璃栈道建设审批流程，并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整治。

据悉，凡在湖南省行政区域的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以及其他旅游景点等自然景区内新建玻璃桥及玻璃栈道的，建设单位应当统一将项目立项批复（投资备案）、选址意见书、初步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相关资料报县级人民政府，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市州人民政府，再由各市州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的方可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不得先建后批、边建边批。

同时，湖南将在全省范围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对玻璃桥及玻璃栈道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坚决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对还未开工建设的，应当按上述规定，尽快报请省人民政府研究；对已经开工建设的要责令立即停工，报请省人民政府研究后，按批复意见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不齐备的，严禁开工建设和投入使用。

（记者：陈焕明）

杭香格里拉饭店东楼将降拆 未来西湖湖景呈现更完美

【凤凰网2019年1月15日】2019新年伊始，关于香格里拉项目在西湖景观这里矗立的讨论预示着一场早先定下的承诺即将履行——早前，西湖申遗，杭州市政府曾承诺，在饭店对外租期结束的时候，将对该建筑（饭店东楼）进行拆除或者降层处理，以保护西湖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整体环境。

1985年的西子湖畔边，接待过无数名流绅士的杭州饭店和西泠饭店合二为一，成为了杭州香格里拉饭店，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饭店。杭州香格里拉饭店的东楼原为西泠饭店，建造于1962年，是一座7层高的西式建筑。当年的西泠饭店有周恩来总理单独的办公用房，周恩来总理来杭州基本就入住于此。跨进这扇周总理曾经跨过的大门，国宾馆式大堂让人一秒陷入回忆，仿佛踏进了历史画卷之中。

香格里拉饭店东楼降拆行动被提上议程，的确让人惋惜。但正如杭州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杭州城市规划研究院原总工程师汤海孺先生所说，“对西泠饭店感情再深，深不过对西湖感情；企业利益再大，大不过国家利益；建筑文化价值再高，高不过世界遗产价值。”对饭店降拆，将是申遗时国家对世界庄严承诺的兑现。这是彰显中国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顺应、利用自然，完善东方山水美学典范形象的必要举措。

东楼是这么美好的建筑，拥有那么美丽的回忆，为什么非要降拆呢？

原因主要集中在：7层，西式。

7层的建筑，耸立于宝石山的半山腰，加上本身的高度，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在高楼层湖景房可以看到最美的西湖风光。但倘若你在湖上游船，或者北山路行走，观感却不似站在东楼上那般美好了——因为与西湖山水不协调，老杭州人还给它起了个绰号：白盒子。

东楼之所以饱受诟病，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太高”导致“惹眼”。无论游客是泛舟西湖还是漫步苏堤白堤，抬眼就可以看到这一建筑物。第二个问题是“太洋”，作为近代建筑形式，它方方正正，与蕴含中国文化的西湖山水不相容，古朴出尘的中式建筑才能与西湖风景相得益彰。第三是色调“不和谐”，东楼外墙颜色是白灰色，和西湖边的青山绿水形成强烈对比，十分“刺眼”。

在杭州西湖申遗过程中，香格里拉饭店东楼被认为是对西湖传统山水风格的破坏，成为了西湖申遗的一个障碍。

降拆这个词，应该还比较好理解，就是降低楼的高度。也表明了，东楼的高度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三面云山一面城，西湖的美，美在自然风光，更美在与繁华城市的无缝对接。杭州这座城市建筑限高，也是为着西湖而来。

有专家认为，城市建筑限高，特别是历史名胜和风景区周围的建筑限高，早已是一个世界共识。更有专家指出，西湖周边建筑如果过高，西湖就会成为一个高楼环立压迫下的“小盆景”。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西湖边“限高”的争议屡见不鲜。

各种因为“限高”而产生的拉锯战也随之而来。当年诸如城中香格里拉、嘉里中心等规划超高楼，在杭州曾掀起轩然大波，后来修改方案，才建成今天的样子。

据了解，杭州主城区区分A至G七个控高区域，对每块区域的限高在18-80米。而相关规定也曾明言，要保护好“三面云山一面城”、“城湖合璧”的城市景观，维护旧城的基本格局，严格限制随意拓宽道路。严禁在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扩建有碍景区保护的建筑物，严格控制周边建筑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保持城市的传统风貌特色。

（杨双双）

社会纵横

珠峰景区“永久封山”不实 多部门将出台更严格环保措施

【新华网、界面新闻、上观新闻综合2019年2月14日】记者近日从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了解到，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珠峰保护区”）将继续有条件开放，依法合规的登山活动仍可进行，网传“珠

峰景区永久关闭”消息不实。

游客大本营撤出核心区 不影响观赏珠峰

珠峰保护区涉及西藏日喀则市定日、聂拉木、吉隆和定结四县，总面积3.38万平方公里，位于中国境内及中尼边界上的五座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均在区内。

每年四至十月，距珠峰最近的乡——定日县扎西宗乡群众会在珠峰脚下搭建可供住宿的黑帐篷，建立游客大本营，提供食宿服务，获得收入。

近日，声称“珠峰景区被永久关闭”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称定日县珠峰管理分局2018年12月发布公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珠峰保护区绒布寺以上区域。

对此，珠峰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格桑表示，确实发布了此公告。从2019年起，游客大本营将后撤至绒布寺一带。

“因为绒布寺以上区域为珠峰保护区核心区。”格桑介绍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条例》中表述：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

2018年，珠峰保护区功能分区重新调整并获国务院批准。调整后，属实验区的绒布寺一带依据《条例》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等活动。

“新的游客大本营区域仍可清晰看到山体和顶峰，不会影响观赏珠峰。”格桑说。

登山大本营位置不变 北坡不存在大规模垃圾问题

珠峰保护区内每年春季还会设立登山大本营，是各国登山者从中国西藏即北坡攀登珠峰的宿营地。

该营地海拔5200米，未获登山许可的普通游客不得前往。营地位于珠峰保护区核心区内，依据《条例》，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格桑表示，登山活动已获西藏自治区林业厅批准，2019年登山大本营位置将保持不变。

记者曾于2018年四至五月间在登山大本营驻扎十余天，其间看到，西藏登山协会设立了专门的环保联络官，每个登山队都被分配了两个分类垃圾桶。“如山”的垃圾堆未曾得见，甚至连零散的水瓶、纸屑都很难在地面上找到。

对于垃圾处理工作，西藏自治区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索南当时向记者介绍，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以下由西藏登山协会协调，在此之上的高海拔区域由商业登山服务机构西藏雅拉香波探险公司承担。

瑞士商业登山组织者卡里·科布勒当时还带记者参观了营地的厕所：坐便器下是一个套着垃圾袋的大桶，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垃圾袋被专人收走远离。2018年登顶珠峰的北大登山队队员当时告诉记者，他们在山峰上也被要求将排泄物收集带回。

西藏登山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排泄物最终将提供给当地农牧民用于农业生产，并非网传的“和圣洁的冰雪躺在了一起”。

“从大本营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之间其实看不到什么垃圾了，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去捡。”扎西宗乡托桑林村村民顿珠说。他是西藏自治区体育局牵头成立的珠峰高山环保大队的一员，专门负责在海拔6500米以下“捡垃圾”。

曾于2016年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户外撰稿人刘政佐证了顿珠的观察：“珠峰存在垃圾，但远没有网络上传得那么夸张。”他向记者描述，海拔6500米到顶峰之间的雪面上是完全看不到垃圾的。只有在一些高海拔营地中，会看到被体力不够的登山者遗留下的氧气瓶等登山用具。

更严格环保措施将出台 平衡多方需求

而这些垃圾也正在被逐步清理。

2018年春季登山季期间，西藏登山管理部门在珠峰大本营及以上区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垃圾清理，收集生活垃圾、登山垃圾、排泄物等共8吨。

今年，清扫活动还会继续。同时，西藏将把参与登山活动的总人数控制在300人左右，并首次对海拔8000米以上的登山者尸体进行集中处理。《珠峰登山垃圾管理办法》也将酝酿出台。

此外，定日县政府和珠峰保护区管理局也将进一步规范海拔5200米以下游客可到达区域的环保措施。

目前，保护区内有85名野生动物保护员，设有1000个生态岗位，均由当地农牧民在业余时间承担巡护、垃圾清扫等工作；旅游垃圾需实行日清理、日登记。未来，保护区拟参照羌塘自然保护区，建立若干专职管护队伍。定日县还计划试运行电动环保车，减少自驾车辆带来的环境污染。

“这些措施是为了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群众脱贫、登山运动和国民教育等不同需求。”定日县县长王琿表示。

目前，围绕旅游和登山活动形成的产业已成珠峰所在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还有许多当地青少年进入西藏登山学校并成长为登山向导。而珠峰地区作为独特的高原、高山生态系统和全球登山运动开展的核心区域之一，也担负着推进户外运动发展与开展自然教育的职能。

链接：珠峰大本营关闭对旅游有影响吗？我们和当地导游聊了聊

成都天涯户外创始人陈飞进入藏区17年，从事户外旅游行业14年。他告诉记者，珠峰大本营原先对游客没有限制，前往大本营的也以登山客为主，2006年后普通游客才开始增加。

尤其是2009年后，珠峰由当地的村子统一开发经营，大本营的帐篷越来越多，保暖等各方面条件也越来越好，当地村民会把方便面、红牛饮料等物资背上山，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游客可以在珠峰大本营落脚，也可以从大本营乘坐环保车，前往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界碑，这是游客可以抵达的最靠近珠峰的地方。

游客活动增加，逐渐给珠峰区域造成了环境压力。陈飞介绍，最初珠峰大本营只有零星可见的个人垃圾和排泄物，到近年已出现泛滥之势。

“绝大部分游客是文明的，都会带走自己的生活垃圾。但一方面大本营接待数量过大；另一方面高寒地带垃圾难以降解，普通区域可以土壤分解的水果皮、果核，在珠峰都需要三到五倍的降解时间。”陈飞解释，“大本营没有固定厕所，就算有简易厕所也没有排污管道。上厕所只能在野外，但人力的处理赶不上排泄物的产生。”

珠峰大本营是一片山坳里的小平地，禁令发布前不完全统计有52个帐篷，每个帐篷每晚可接待最多20人，一年营业6个月，大约能接待近两万人，还不包括当地人。

据携程统计，2018年通过携程跟团游赴西藏人数增长30%左右，前往珠

峰游客增长更快，将近50%，总人数超过14万人次。自2018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组织清理珠峰保护区海拔5200米以上的垃圾约8.4吨，其中包括登山活动产生的食品包装袋、食品罐子、酒瓶等生活垃圾约5.2吨，旧登山绳子、旧登山帐篷、旧瓦斯罐等登山垃圾约1吨，登山人员排泄物约2.2吨。

陈飞认为，旅游区域下撤2公里，将对珠峰的垃圾清理、环境减压起到重要作用。“珠峰大本营就在珠峰脚下，垃圾和排泄物的累积都可能造成冰川生态变化。退还之后，这片地区能起到隔离带的作用。”他说。

携程主题游平台在2月14日发布了关于珠峰旅游活动中保护生态、不留下垃圾的倡议书。西藏区域负责人韩琳告诉记者，国内游客赴藏偏好以拉萨+林芝地区为主，抵达珠峰大本营的游客估计在十分之一左右。整体来说，珠峰大本营关闭对西藏旅游应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不过，前往珠峰大本营是不少当地旅游公司的重要行程之一，陈飞自己的公司就有50%的产品安排了珠峰行程。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游客不能再前往珠峰大本营，会对他们的业务产生影响吗？

“我认为不会。”陈飞表示，“从去年12月份收到公告后，我们商家就在做相应的准备，调整产品，响应旅发委的倡议。原本前往珠峰大本营的线路调整为去绒布寺，两地仅相差约2公里，而绒布寺也非常适合观赏珠峰日出日落。”

他告诉记者，往年每到11月初至11月中旬，当地老百姓会撤下珠峰大本营的所有日用设备，到来年3月底4月初，再统一由当地村委组织人上去搭建。从今年开始，帐篷等旅游设施将挪至绒布寺。

“西藏旅发委一直为环境保护做出努力。我们当地的旅游业者已经听到消息，今年会更加注重旅游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措施，比如在绒布寺做好垃圾处理的准备，预计会建立公共厕所、与游客签署环境责任书等。”陈飞表示，“我们很支持这项调整，在西藏这么多年，希望以后的人都可以看到美丽的珠峰。”

延伸阅读

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当地脆弱的自然生态或文化遗产，都会对游客或专业考察者发出类似“珠峰禁令”这样的限制，包括必须先预约才能进入某些区域，或者完全禁止普通游客进入等，一部分区

域预约后还需交纳一笔不菲的费用用于当地环境维护。

比如，新西兰最出名的步道米尔福德步道（Milford track）开设至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为了尽量对步道沿线的生态环境减少破坏，这条全程53公里的步道每年都只开放一定额度进入的名额给旅游者，想进入的游客一般都要提前半年到一年在网上预约，且每位游客需交纳超过1500人民币的费用。而在徒步时，游客进入步道前需要先将鞋底消毒，避免带入外界的入侵生物种子或虫卵等，离开时必须将所有的垃圾都带出去，连一颗苹果种子都不可以乱扔。

在中国台湾地区南部的垦丁，一个名为龙坑的景区同样实行严格的进入预约制。因为有着215种珊瑚礁，是上千种鸟类爬行动物的家园，同时也是海岸植物的保护区，处处可见崩崖、裙礁、峡谷等绝佳景观，龙坑同样是游客们心中的旅游胜地。但龙坑在开放时间段每半天只允许50名外来游客进入，并需由解说员带领入园，以避免游客自行进入后随意踩踏指定路线外的区域，破坏植被。

可见，对于不可复制又极易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区域，限制人类进入以尽量减少人为破坏是通行做法，“珠峰禁令”对于珠峰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王沁鸥、李宝花、郑萃颖）

时事评论

“循古向新”才能可持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2月12日】古城保护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有人认为应保持原汁原味，不可轻易改造；有人则把古城当成会下金蛋的母鸡，在大拆大建中使古城流失其固有的文化活力，沦为过度商业化的“盆景”。我们到底该如何让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

其实，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冲突。如果忽略保护而一味地拆旧建新，会破坏原有空间格局，使原住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消

失。但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发展，古城同样会因丧失生命力而沦为“死城”。

笔者认为，在“循古向新”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古城保护的可行之策。

“循古”即秉承文保思维，在古城原有布局和特色基础上，保存好历史建筑、文化习俗的原貌，同时，对其内部格局和周边风貌进行全方位保护和修复，这个修复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生态修复。

古城的生态修复要体现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尽量恢复古意浓浓的自然风光。要让古城融入到它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实现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江南水乡绍兴通过疏浚清淤，将15条河道和多个湖池水面保留至今，修复破损河坎、增加沿河绿地54万平方米，形成了“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的古城风貌，“绍兴模式”延续了水巷小弄的生命力，也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奖。

“向新”则是以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和现代科技手段，引导古城尽快转变现有开发模式，在有序状态下对古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传承，处理好商业利益和古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片面地“循古”和过度地“向新”，都远离了古城保护的初衷。如果把原生态的历史文化内涵比作古城发展的“肌肉和骨架”，那么创新保护理念与开发模式就是古城可持续发展的“血液”，二者密不可分。

（林曦）

国家公园的方向：保护第一 公益优先

【中国科学报2019年1月29日】国家公园与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是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建立完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全球公认最有效的自然保护手段。

自1956年以来，中国陆续建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水源保护区等十几个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数量已经过万，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8%。这些自然保护地对保护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代表性生态系统、壮美的自然景观、重要的地质地貌和历史文化遗迹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大熊猫、藏羚羊和朱鹮等濒危物种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申报和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

虽然中国在自然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还不能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享受自然美景、身心健康和精神文化价值的需求，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要求。因此，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初衷就是要树立“生态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优先”的理念，三大目标并重，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

树立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

提起国家公园，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极具震撼力的名川大山、蓝天白云、壮美的峡谷和瀑布、魔幻般的山峰和冰川、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自由咆哮的野生动物、尽情飞翔的鸟、清澈流淌的河流、湖边篝火旁的畅谈和自由自在的家庭旅行。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1872年美国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当时，美国正处于鼓励人们征服自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时期，大量森林被砍伐、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被猎杀。建立美国国家公园的构想，正是为了遏制这些野蛮的开发行为，保护那些非常重要的自然遗产免遭破坏。然而，美国国家公园也经历了大量修建道路、旅馆和宿营地，开发旅游景点、吸引大量游客、忽视当地原住民权益等过度开发的阶段，这些自然保护地也曾经沦为商业产品。

随着科学发展和保护意识的提高，荒野保护、物种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恢复、社会公平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公园构想的主流。

在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不是把现有的自然保护地都统统叫作国家公园，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符合国家公园标准的自然保护地直接转变成国家公园，或者对符合国家公园标准的两个或多个自然保护地整合组建或扩建成为国家公园，也可以在符合标准的区域新建国家公园。与此同时，对于未划入国家公园的其他所有自然保护地类型，按照统一的分类标准进行系统的科学分类。在此基础上，构建完整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主要目标是加强自然保护，解决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重叠交叉、多部门分头管理等问题，立法规划等存在部门利益难以一致、保护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央与地方事权不清晰、支付责任不匹配，导致政府投入不足、公益性缺失的问题，等等。因此，建议

统一规划与管理，从根本上解决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地的现状。同时，以保障国家长远利益和生态安全为出发点，行使相关的监管职责和提供资金保障，制约过度开发的冲动。通过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事权和资金保障的机制建设，来充分体现国家公园体制的“生态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优先”的核心理念。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及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目的是在整合组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配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开展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的系统评估，推动跨部门公众参与的社会立法，依法界定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资金机制、监测、监督和考核机制，理顺和完善中国自然保护地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遵守和执行同一个法律，依法管理好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最终实现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依法管理。

理顺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建设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善性，必须坚持自然保护第一、严格保护、有限制地利用的理念。因此，应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目标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结合，尤其是要与主功能区规划、划定和管好生态保护红线紧密结合，选择自然价值和风景文化价值最高的区域，整合组建或划建国家公园，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确保其自然状态不受损害、自然与文化价值不降低。同时，对其他所有的自然保护地类型进行科学梳理，该严格保护的要严格保护起来，需要恢复的区域得到恢复，需要其他方式干预的进行合理干预。对那些允许可持续自然资源利用的区域进行合理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国自然保护地的有效管理。

中国历史悠久，没有人居住和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地很少，没有人烟的荒野区域也不多。多数地方，包括自然保护地内和周边地区都有长期或短期的人类活动。建立国家公园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移民搬迁。因此，保障和提高当地（国家公园内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利益，让他们参与国家公园治理与管护，为他们寻找替代生计来源，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完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实现有效管理的途径之一。

建议根据自然资源权属和资源利用的传统，提供社区参与国家公园规划设计和方案制订、实施，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的协商与决策，充分保障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

国家公园是珍贵的自然瑰宝，是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精华，是最重要的代表性生态系统的核心、荒野区域的代表、野生生物的乐园，还是自然实验室和自然保护的指针，也是大众游憩的胜地和人类的精神家园。相信中国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会取得更好成就，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目标。

（朱春全）

世界遗产

修复吴哥：一场跨越26年的30国抢救行动（下）

【腾讯网2019年1月22日】吴哥的修复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古迹修复理念与技术的变迁。

理念之争

建筑师碧欧菲斯特告诉作者，20世纪初，因为寺庙被苔藓和植物覆盖，很多石头被植物根系严重破坏，法国远东学院对吴哥古迹的修复手段，主要是“清洗”。

1930年，修复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的荷兰专家卡伦费尔斯造访吴哥古迹。他口中的Anastylosis修复法，给了法国远东学院专家很多启发。

Anastylosis是希腊语，可译为“原物归位”。它是指在修复古迹时，尽量使用原来修建寺庙的方式和材料，避免使用现代材料。

首个尝试原物归位法的吴哥古迹，是竣工于1002年的女王宫。它是吴哥古迹中最为秀美的庙宇，雕刻精美绝伦。法国远东学院考古部主任亨利·马夏尔和他的团队，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柬埔寨内战爆发后，女王宫再遭破坏，后瑞士修复队接手。）

但人们逐渐意识到，原物归位法并非适用于所有建筑——1943年的一个

雨夜，修复不久的巴方寺二层北部突然倒塌。专家们发现，全部使用传统技艺修复存在不妥，于是在沙石层中添加了混凝土带，以保障古迹的安全。

在1990年代多国参与吴哥古迹修复之后，采用何种修复方式，开始成为业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尽管吴哥古迹的修复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局监督下进行，但来自不同国家的修复团队，在理念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差异。因为修复工作被严厉批评，印尼队更是在1990年代末撤离后就未重返。

瑞士吴哥古迹修复工作负责人于理·萨斯曼告诉作者，围绕修复工作的最大争议是：应该保留现有建筑受损的样子，还是应该恢复它以前的样子？要复原到什么程度？复原的界限在哪里？

“有些国家复原得多一些，有些国家复原得少一些。”萨斯曼说。

比如，有些国家使用解体和重建的方法，进行“解体式修复”；有些国家则尽量维持现状。在修复塔松寺时，英国队只对建筑框架进行了修复和加固。对于女王宫，瑞士队只修复了寺庙门和入口道路等几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不希望把女王宫修得很新很假，像是一个迪士尼乐园。”萨斯曼告诉作者，“如果彻底恢复女王宫原貌，就需要拆除现有结构，添加新的材料和雕刻。但我们不希望那样做。女王宫的部分魅力，在于它并不完美。”

在是否采用新材料的问题上，各国态度确有不同。最初提出原物归位法的希腊建筑师博拉尼奥斯曾指出：使用原物归位法修复古迹时，在一些关键部分，允许慎重、合理地使用新石头，以替代丢失的石头。在实践中，他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

日本队在修复巴戎寺时，使用了新开采的石砂打地基。“在遵循原始建筑技术的基础上，也应融化新技术。理论上说，寺庙之所以美，源自它们古老陈旧的容貌。它们的生命就像人的生命，会变老，最终会死。这是一件自然而美丽的事，它们变老的样子也是美的。对于人类而言，医疗可以助其延长生命，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延长寺庙的寿命。”日本吴哥遗产救援队技术顾问下田一太曾这样告诉《金边邮报》记者。

中国队也使用了新石头，为此一度引发争议。2008年3月，《金边邮

报》报道：“中国工作队采取了一种不同的修复方法……用新石块替换缺失的部分。” 当时中国在修复周萨神庙，这也是中国文物保护界首次开展国外文物保护项目。

在周萨神庙现场，作者看到展示牌介绍，除将散落的4000余件石构件复位外，中国队还对周萨神庙“约30%-40%已经风化破碎或丢失的石构件进行了补配”。

黄雯兰表示，在修复茶胶寺时，因为有些石头消失或断裂严重，中国队也使用了新石块，但新石块的使用量控制在15%以内。补配的新石块来自荔枝山附近的采石场，即古代吴哥寺庙营造的石源地。使用那里的石头，需要向柬埔寨政府申请，且它们只能用于文物修复。

“如果只是保持遗址原样的话，几乎可以不用配额外的石头，或者可以只配很少来解决结构稳定问题。但如果是恢复到某种程度，就需要补一些石头。这是关于维修方法的争论，而不是所使用的石头的量的问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顾军表示。

作者在茶胶寺现场看到，这些补配的新石块，很容易就能被辨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郑军表示，“这遵循的是古迹修复的可识别原则：新配构件与原构件应有区别，以保证吴哥古迹的真实性，避免游客误会。我们会对新补配的石块进行表面处理，使建筑整体和谐。”

文物修复没有一定之规，围绕一些修复时的具体操作方式，不同国家也有不同意见。在2017年12月接受《高棉时报》采访时，德国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专家易·索福尔斯就表示，有些国家在一些项目中使用胶水注射，这并不可取。因为胶水基本密封了砂岩表面的空隙，将水分封闭在石块中，这加速了砂岩内盐的生成，可能会导致对现有结构的破坏。

“每一个国家队都在吴哥发挥了本国的文物保护优势，日本队细致认真，注重研究和监测。德国队严谨，集中在石刻保护上。法国是对吴哥研究最为深入的国家，保护了大量的古迹，建立了吴哥古迹研究的基础。中国队踏实的作风赢得了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管理局的认可。”一位修复专家如是评价各国的修复风格。

在一个问题上，多国修复团队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如何对待古树。这些古树盘根错节，和古建筑生长在一起，后者因此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但如果古树被去除，建筑又可能失去支撑，在瞬间坍塌。

在印度队最初修复吴哥时，一些树被砍伐。1998年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反对砍树。各国逐渐达成了一致：让树木和建筑融为一体。在修复几乎被丛林吞噬的塔布隆寺时，印度队完全遵循了这个共识。

如今，在塔布隆寺，游客都被古树和建筑相偎相依的情景打动，认为这样的景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挚爱

庄严肃穆的神庙、神秘微笑的四面佛、婀娜多姿的仙女浮雕……令古迹重获新生的保护者们，同样为它们的美深深折服。为此，他们不惜奔走一生。

石泽良昭与吴哥古迹的缘分，已持续了58年。2001年，在修复斑黛喀蒂寺时，他带领的日本上智大学考古队挖掘出274尊佛像，为吴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2017年，因多年致力于吴哥遗迹保护，石泽良昭获得了有“亚洲版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塞奖。这个奖项过往的获奖者，有费孝通、袁隆平和梁从诫。

2011年，法国对巴方寺的修复项目结束，为时长达16年。这意味着，罗耶也为巴方寺工作了整整16年。他和柬埔寨的感情如此之深，甚至还因此收养了一个柬埔寨孩子。

此后，罗耶又被任命为西梅奔寺修复负责人，但不久，他便被诊断出癌症。2014年，罗耶去世，年仅49岁。

2017年3月，在ICC（保护和发展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第23次全体会议上，法国远东学院主任夏洛特·施密德向在场者推荐了一本书。它是关于罗耶如何修复巴方寺的——罗耶的同事根据罗耶发表的论文、笔记、照片和在他几台电脑上找到的文件，完成了这本书。对主持修复巴方寺的罗耶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今天，在巴方寺的说明栏旁，还有一座标注着罗耶名字的纪念碑。

“柬埔寨的古迹应该由柬埔寨人去保护和修复，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培训和支持。”石泽良昭告诉作者。他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帮助柬埔寨皇家艺术大学考古方向的学生赴日深造。目前，日本队已与柬方成立联合工作队，后者站到前台，负责维修工作，日方则提供经费和支持。

和日本类似，多个国家都在帮助柬埔寨培养修复人才，以期在未来，柬埔寨人才能够独立担负起修复吴哥的重担。

在修复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的过程中，中国专家也与当地人才紧密合作。和吴哥初建时不同，现在柬埔寨民居多为木制，石匠极少。为此，中国队因地制宜，从当地选择了一批具备一定技巧的当地木匠。从中国远道而来的高级石工，手把手教他们石材加工、雕刻、构件安装等技巧。“现在他们水平很高，有人甚至成了其他国家工作队的骨干。”顾军说。

他不愿用“培养与被培养”来形容中国专家与修复队中的柬埔寨考古人才的关系。在他看来，后者帮助中国专家管理工人，对柬埔寨传统工艺、国情民情的了解也更深，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学习”。

2018年，是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启动的第25周年。在这一年的12月，因为对吴哥古迹保护做出的贡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许言、王元林和顾军，从柬埔寨文化艺术大臣彭萨格娜手中，接过了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获此殊荣的，还包括三十余位保护吴哥的多国专家。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将位于大吴哥城核心区的王宫交给中国队保护和修复。“中国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也已更名为“中国-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以示两国合作的紧密程度。各国对吴哥古迹的修复，仍在进行中，仍任重道远。

距穆奥第一次目睹吴哥窟的那一天已经有158年了。在此期间，被掩藏在原始丛林中的古老废墟，目睹了人类的残酷厮杀，也险些再次葬身战火。

如今，作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吴哥再次绽放。

（撰文：崔莹 编辑：李文隽）

环球博览

厄瓜多尔政府多举措拯救加拉帕戈斯环境

【央视网2019年2月10日】位于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曾经因进

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驻足探究物种差异而闻名遐迩。近年来，加拉帕格斯群岛的生态系统因全球变暖而受到严重冲击，一些独特物种恐遭灭绝威胁。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加拉帕格斯群岛从火山中诞生。每座岛屿各具特色，岛上草木茂盛，各种生命隐藏其间。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岛上的野生动植物中得到启示，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生命的整体理解。

加拉帕格斯群岛面积达13.8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之一。这片岛屿拥有超过2900种物种，其中许多都为这一区域独有。

因为缺乏大型捕食者，岛上的绝大部分动物都没有天敌，所以对周围环境的警惕性非常低。皮肤如礁石般粗糙的海鬣蜥与游客共享街道，在长椅上打盹儿的海狮也丝毫不介意人们抓拍它憨态可掬的样子。

然而，表面上的平静和谐却在逐渐发生变化。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生活在加拉帕格斯，不论什么季节出门，都要携带两样东西。一样是防晒装备，而另一样则是雨具。因为这里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变幻莫测，此刻的晴空万里或许会在一瞬间变成倾盆大雨。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说，2018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约为14.68摄氏度，比1850年至1900年的工业化前基准线高出近1摄氏度。气候变暖给全球生态系统逐渐造成影响，加拉帕格斯群岛或也无法幸免。

红树林苍头燕雀是大名鼎鼎的达尔文雀的其中一种，它的生存岌岌可危。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加拉帕格斯研究站科学部主任玛利亚·巴瑞甘说：

“目前在加拉帕格斯只有约100只红树林苍头燕雀，它们处于濒危的境况与寄生蝇的出现不无关系。寄生蝇以雏鸟为食，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有可能使这些寄生蝇的繁殖速度加快，从而使红树林苍头燕雀的繁殖受到负面影响。”

观察人士提示，如果再不采取有效举措，或许会有更多的独特物种面临灭绝危机。

政府多举措拯救加拉帕格斯环境

据加拉帕格斯群岛圣克鲁斯政府消息，当地将于今年2月26日起全面禁止一次性包装的啤酒及汽水等饮料登岛及在岛上销售，这也将成为厄瓜多尔当局禁止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的生物圈保护区使用带有手柄的塑料袋、吸管和塑料瓶后的又一项保护当地环境的重要举措。

当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理事会的研究员在当地雀类的巢中，以及海龟和信天翁的胃中都发现了塑料垃圾时，他们知道人类正在改变加拉帕戈斯这一原始生态系统。

加拉帕戈斯群岛圣克鲁斯政府环境处处长马里奥皮乌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海洋的塑料分解成颗粒，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它们分解成颗粒后，进入到食物链中。小鱼吃了遭到塑料颗粒污染的海藻，大鱼再吃这些小鱼。以此类推，现在已经直接对我们人类的健康造成影响。”

据估计，每年高达1300万吨塑料流入海洋，其中至少有50%的垃圾是由一次性塑料组成的，而这些塑料会在环境中存留至少500年。

在垃圾处理中心，记者找到了这样一个塑料的饮料瓶，上面的产地写的是秘鲁，这显然不是加拉帕戈斯本土的产物。据了解，仅在去年一年，群岛及其周围就收集到了200吨的塑料垃圾。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塑料垃圾几乎全部都来自于其他地方。

根据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数据，2018年有约28万人访问了群岛，比十年前翻了将近一番。在加拉帕戈斯，约90%的居民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而他们的平均收入也明显高于厄瓜多尔的其他地区。毫无疑问，游客的到来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更多垃圾。

当地居民表示，群岛的生态遭到破坏和威胁，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除了积极参加清理海洋垃圾的行动外，当地政府正在努力实施对废物的有效管理。每家每户都需要将垃圾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及有机垃圾等进行分类，违者将接受罚款。

“我们岛上对固体废物的回收率已经超过了50%，在厄瓜多尔全国范围内都位居前列。”加拉帕戈斯群岛圣克鲁斯政府环境保护专员艾伦说道。

此外，当地政府还在中小学中加入环保课程，倡导减少生活垃圾，拒绝浪费及推动循环利用等。

（记者：廖军华）

奇里比克特山脉国家公园成全球最大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中国绿色时报2019年2月13日】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报道，哥伦比

亚奇里比克特山脉国家公园的面积已扩大到430万公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受保护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2018年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这个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以肯定其对自然和人类的突出而普惠的价值。

奇里比克特山脉国家公园位于哥伦比亚亚马孙中心地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是亚马孙北部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公园作为数千种动植物物种的栖息地，为很多受到威胁的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包括低地貘、巨獭、巨型食蚁兽、绒毛猴、美洲豹和哥伦比亚亚马孙地区特有的奇里比克特翠绿蜂雀。

除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以外，保护区对原住民社区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拥有美洲最古老、规模最大、最密集的考古象形文物群。在茂密森林中的高耸岩层上，有着由超过7万幅古代绘画组成的50幅壁画，描绘了动物、狩猎、战斗和舞蹈的场景，距今有2万多年的历史。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生物多样性国家。奇里比克特山脉国家公园自1989年以来一直被划为保护区，是哥伦比亚第九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对这一地区的保护有助于为整个亚马孙地区提供必要的缓冲区，防止野生动物走廊中的森林退化。

(李茗)

编 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风景名胜》编辑部

联系人：张 立 陈 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100044

电 话：010-88315330 88315324

传 真：010-88315325

微信公众号

网 址：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

